

浅析农业史与环境史的联系

高国荣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006)

【摘要】农业史与环境史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密切关联。在美国、欧洲和中国,农业史都是环境史的重要学术源头之一,为环境史的兴起在学术资源和人才队伍方面创造了一定条件。农业生态史一直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从环境史研究最为兴盛的美国来看,农业生态史著作在 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为环境史在学界赢得了一席之地;农业生态史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一直占环境史研究的主导地位。尽管近 30 年间美国环境史研究出现了很多新变化,但农业生态史依然是重要领域。从环境史兴起以来,环境史学者与农业史学者之间的交流合作一直存在,而且日益频繁和密切。环境史的价值在美国农业史学界得到了广泛认可,农业史研究的生态转向在未来将会更加明显。

【关键词】农业史;环境史;美国;中国;联系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8)02-0117-11

A Tentative Analysis of Connections between Agricultural History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GAO Guo-rong

(Institute of World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Abstract: Environmental history has inherent and close connections with agricultural history. Its origin in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all could be partly traced back to agricultural history which make the ris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possible by providing the academic resources and the talented scholar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environmental history is most prosperous around the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 won a place of its own around 1980 through the appearance of some landmark books on agriculture. Agro-ecological history was prominent in the 1980s, and has still been very popular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since the early 1990s when the cultural turn emerged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studies. The exchanges between environmental historians and agricultural ones, available since the ris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frequent and common. The valu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has been widely appreciated by the American agricultural historians, and the ecological turn of agricultural history will be more obvious in the near future.

Key Words: agricultur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the U.S.A.; China; connections

约翰·奥佩(John Opie)是美国环境史学会的主要创始人。1976-1977 年间,他和沃斯特(Donald Worster)、福莱德(Susan Flader)等学者,创办《环境评论》(Environmental Review)杂志,并成立了美国环境史学会。实际上,奥佩最初拟成立“美国土地研究协会”(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the American Land),拟

[收稿日期] 2018-02-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环境史及其对史学的创新研究”(16ZDA12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930 年代美国大平原的土地沙化及其治理研究”(14BSS037)

[作者简介] 高国荣(1973-),男,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欧美环境史研究。

将学会刊物命名为《土地与生命》(Land and Life)。这两个名称因为被认为“包容性不够”而未被使用,最终采纳的是沿用至今的“美国环境史学会”这一名称,而学会刊物则题为《环境评论》^①。在1980年代初期,美国环境史学会处境异常艰难,由于经费短缺,甚至连出版《环境评论》都难以为继。当时,美国农业史学会也面临重重困难。农业史教学仅限于少数高校,其专业期刊《农业史》杂志的订阅量减少,依靠农业部资助才得以运营。在这种情况下,时任美国环境史学会会长沃斯特和《农业史》杂志主编夏德勒(James Shideler)讨论过两刊合并的问题^②。夏德勒希望刊物合并后要以农业史为主,而沃斯特等人则希望保留环境史的特性。在《环境评论》的创刊人之一休斯(J. Donald Hughes)从所在的丹佛大学申请到了刊物出版资助后,两刊的合并不了了之。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美国环境史学会最初关注的问题和美国农业史学会近似,双方在同一时期面临生存困境时甚至想到了相互联合。农业史和环境史的密切联系由此可窥见一斑。

在追溯环境史源头时,农业史^③常常会被提及。在各国环境史研究中,农业生态史大多占据重要地位。农业史和环境史在某些方面存在交叉重合,都经历了社会史的转向,都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研究的性质。尽管农业史和环境史存在密切联系,这种联系却很少为中外学界所关注^④。探讨农业史和环境史的联系,有利于厘清和把握这两个领域的发展轨迹和未来方向。考虑到环境史在美国兴起最早、发展最为繁荣,笔者不揣冒昧,主要结合环境史在美国的发展历程,尝试对环境史与农业史的联系稍作分析^⑤。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是自然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紧密融合。农业作为一种社会生产,是指人类通过劳动,利用、调节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形成人类所需农产品的过程。农业依赖于自然环境,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地域性和不稳定性都与自然环境因素直接相关。同时,农业生产对自然环境产生了最为广泛深刻的影响。农业是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体现了人类与自然的协同进化。农业在取得进步的同时,农业环境问题也随之出现,并随着现代化农业的发展而日渐凸显。

基于农业与生态之间的天然联系,农业史与环境史也存在着密切关联。在很多国家,环境史的源头之一就是农业史。农业生态史自始就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方面。环境史研究的突破,也是从农业生态史开始的。此外,环境史与农业史两个领域的学术交流一直存在,而且日益增多。

① John Opie, Mark Cioc and Char Miller, “Interview: John Opie,” *Environmental History*, Vol. 14, No. 2 (Apr., 2009), p. 358; Thomas R. Cox, “A Tale of Two Journals: Fifty Year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Its Predecessors,” *Environmental History*, Vol. 13, No. 1 (Jan., 2008), p. 20.

② Mark Harvey, “Interview: Donald Worster,” *Environmental History*, Vol. 13, No. 1 (Jan., 2008), p. 142.

③ 农业史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农业史将农业视为一种生产方式,主要是指包括农林牧渔在内的农业生产史和农业经济史;而广义的农业史还将农业视为一种生活方式,乡村社会史因而成为农业史的重要研究方面。从国内外农业史的发展来看,农业史都经历过社会史的转向,并在此前后从传统的农业生产史拓展到新近的乡村社会史。本文因探讨农业史对环境史兴起的促进,所指的农业史主要是指传统的农业生产史。

④ 对此有所提及的文章包括: Donald Worster, “Transformations of the Earth: Toward an Agroecological Perspective in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6, No. 4 (Mar., 1990), pp. 1087–1106; Sara M. Gregg, “Cultivating an Agro-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Douglas Sackman, ed., *A Companion to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pp. 425–441. 目前国内还没有学者就此进行专门论述,但有一些文章提到了以往农林牧渔史研究的成果对环境史的促进,比如: Bao Maoho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China,”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Vol. 10, No. 4 (Nov., 2004), pp. 475–499. 王利华:《中国生态史学的思想框架与研究理路》,《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梅雪芹:《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史学月刊》2009年第6期。

⑤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过沃斯特、皮萨尼(Donald Pisani)、赖尼-凯尔伯特(Pamela Riney-Kehrberg)、埃文斯(Sterling Evans)、赫西(Mark Hersey)等多位美国农业史或环境史学者的帮助,前三位学者曾担任美国环境史学会或农业史学会会长,埃文斯现任美国农业史学会副会长。另外,王思明、王利华、梅雪芹、徐旺生、李昕升等师友也予以指点,在此一并致谢。关于农业史与环境史的差异,笔者拟撰专文另行探讨。

一、农业史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源头

农业史是环境史的重要源头之一。在对本国本地区的环境史进行追根溯源时,美国学者常常会提及西部史和南部史;法国年鉴学派对环境史的贡献常常为欧美学者所称道;而中国学者则会提到以往的农林牧渔业史研究。在美国,西部史和南部史都是环境史的重要源头,传统的西部史和南部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农业拓殖的历史,其中大量涉及环境或自然因素。

西部史^①成为环境史的源头,常常是与特纳、韦布(Walter Webb)和马林(James C. Malin)联系在一起的。这三位西部史的开拓者均为美国农业史学会会员,都侧重于研究美国向西部的农业拓殖,都极为重视自然因素对美国历史进程的影响。特纳在1892年就倡导从环境的角度考察美国历史,将自然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联系起来加以探讨。他说:“有关环境对美国发展历程的影响,现在还很少研究……一旦地质学家、气象学家、生物学家和历史学家携手开展这项研究,他们将会发现美国历史如何在大体上(largely)是由自然条件所决定的。”^②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特纳从环境的角度解释美国的发展,提出了著名的“边疆学说”,提出“无主土地区域的存在及其不断的收缩,以及美国向西的拓殖,就可以说明美国的发展”,他还提到“渴望土地和热爱蛮荒的自由不断把边疆向前推进”^③。尽管商人和矿工作为先锋^④,在拓荒者到来前已经涉足西部的一些区域,但正是农民对土地和自由的渴望,“农业边疆”向西层层推进,才真正使拓殖落地生根。无论是在殖民地时期,还是在美国建国之后,农业扎根都是拓殖成功的主要标志。特纳学说因而被称作“美国历史的农业解释”^⑤。1922年,特纳在美国农业史学会主办的一场活动中应邀就农业史做主题演讲^⑥。特纳在威斯康辛大学(1889-1910)和哈佛大学(1910-1924)任教期间,指导过很多学生,克雷文(Avery Craven)、戴尔(Edward Dale)等农业史名家都出自他的门下^⑦。

如果说特纳探讨的是农业边疆的逐步扩展,韦布和马林所从事的则是中西部区域农业史研究。韦布的名作《大平原》^⑧将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拓殖联系起来,侧重于自然环境对大平原农业开发的诸多限制。该书奠定了韦布在史学界的地位,韦布在1958年还当选美国史学会会长。马林在1943-1944年曾任美国农业史学会会长,其代表作《北美草地历史导论》^⑨则阐释了人类依靠科技进步在草原进

① 传统的西部史就是边疆开拓史,往往以1803年“刘易斯、克拉克的西部探险为起点”,以19世纪末中小农场主掀起的“平民党运动为终点”,不涉及19世纪末期以来城市工业社会的兴起。传统西部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农业史。参见 Patricia Limerick, et al., eds., *Trails: Toward a New Western History*,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1, pp. 98, 105.

② Frederick Turner, “Problems in American History,” in *Frontier and Section: Selected Essays of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edited by Ray Allen Billingt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1, p. 30.

③ 特纳:《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杨生茂编:《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23页。引文参考了张芝联先生的译文,但略有改动,笔者将“free land”译为“无主土地”而非“自由土地”。

④ 特纳因其种族偏见,无视印第安人的存在。

⑤ James Malin, *History and Ecology: Studies of the Grassland*, edited by Robert P. Swierenga,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4, p. 71.

⑥ Wilbur R. Jacobs, “Research in Agricultural History: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s View in 1922,” *Agricultural History*, Vol. 42, No. 1 (Jan., 1968), pp. 15-22.

⑦ Dennis S. Nordin, “Graduate Studies in American Agricultural History,” *Agricultural History*, Vol. 41, No. 3 (Jul., 1967), pp. 275-312.

⑧ Walter P. Webb, *The Great Plains*, Boston: Ginn, 1931.

⑨ James C. Malin, *Grassland of North America: Prolegomena to Its History*, Gloucester, MA: Peter Smith, 1947.

行农业开发的历程。马林率先提出了“生态史”，并将人类史视为自然史的一部分，尝试着“从生态的角度对美国历史进行重新审视”^①。他被认为是“很可能是现代环境史的创始人”^②。

在美国，环境史与南部史也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南部在历史上长期实行奴隶制种植园经济。在二战以前，农业史成为南部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甚至主要特色。在 20 世纪上半期，南部史学者“在很大程度上都会将自然世界融入其成果”^③。克雷文、菲利普斯、格雷三位学者的成果尤其明显。克雷文出版了《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农业史中的土壤侵蚀因素》^④。该书探讨了从殖民地时期到内战前夕美国南部种植园经济对土地的滥用以及土地退化所引起的经济危机。该书以历史事件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为中心，为美国的史学书写指引了新方向。菲利普斯的《内战前美国南部的生活与劳工》^⑤是一部社会经济史著作，该书从气候、水土、地形等自然因素探讨南部种植园经济的形成及其合理性。格雷是“新政”时期农业部改革派官员，他的著作《美国南部农业史》^⑥也较多地涉及自然因素，他对种植园经济持批判态度。上述三位学者曾在 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担任美国农业史学会会长或副会长职务，南部史与农业史的密切关联由此可见一斑。这种关联随着战后民权运动的兴起而有所削弱，在南部环境史兴起后又被人所关注。1995 年克罗斯比在追溯环境史在美国的源头时，首先提到的就是南部史学家克雷文及其上述著作^⑦。随着南部环境史的兴起，斯图尔特、赫西等人都揭示过南部农业史著述对环境史兴起的意义。斯图尔特指出，农业史是美国环境史的重要源头，并认为这种溯源有利于克服美国环境史研究中的“美国例外论”，符合环境史在美国以外地区发展的整体潮流^⑧。

正是基于两者的渊源关系，当下的环境史研究重镇往往诞生在具有农业史研究传统和优势的院校。威斯康辛大学、堪萨斯大学和俄克拉荷马大学均为美国环境史研究的重镇，从 1977 年至 2018 年，美国环境史学会共产生了 20 任会长，而来自这三所高校或曾在此任教的会长共计 8 任，占 40%。这三所对环境史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高校都有农业史研究的传统。在 20 世纪上半叶，威斯康辛大学的农业史研究声名显赫，受特纳的影响，历史分析受到农业经济系的高度重视，泰勒(H.C. Taylor)本人及其多位弟子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农业部参与农业决策。除特纳和泰勒外，菲利普斯(Ulrich B. Phillips)、盖茨(Paul W. Gates)、博格(Allan G. Bogue)等权威农业史专家都曾在该校受教或任教。威斯康辛大学作为全美最知名的环境史重镇之一，诞生了克罗农、兰斯顿(Nancy Langston)、米特曼(Gregg Mitman)三位环境史学会会长。堪萨斯大学农业史学者马林对环境史的贡献为学界广泛认可，除他之外，该校还有一位知名农业史学者安德森(George Anderson)，两人在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都曾担任美国农业史学会会长，该校农业史方面的传统在如今转化为农业生态史研究在全美的领先优势，目前有

① James Malin, "Ecology and History", Scientific Monthly, Vol. 70, No. 5 (May, 1950), pp. 296-297.

② Richard White,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Historical Field,"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54, No. 3 (Aug. 1985), p. 297.

③ Mark D. Hersey, "The Lay of the L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the South, and Kentucky," Register of the Kentucky Historical Society, Vol. 115, No. 2 (Spring 2017), p. 135.

④ Avery Craven, Soil Exhaustion as a Factor in the Agricultural History of Virginia and Maryland, 1606 - 1860, Urbana: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26. 美国历史学家协会为表彰他的贡献，设立了克雷文奖(美国内战与重建时代优秀著作奖)。

⑤ Ulrich B. Phillips, Life and Labor in the Old South,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29.

⑥ Lewis C. Gray, 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the Southern United States to 1860, Washington, D.C.: Carnegie Institute of Washington, 1933.

⑦ Alfred Crosby,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0, Issue 4 (Oct., 1995), p. 1182.

⑧ Mart A. Stewart, "If John Muir Had Been an Agrarian: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West and South,"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Vol. 11, No. 2 (May 2005), p. 139.

包括沃斯特、库什曼(Gregory Cushman)、格雷格(Sara Gregg)在内的5位环境史学者。俄克拉荷马大学的西部史研究一直是其强项,曾拥有戴尔·菲特(Gilbert C. Fite)、诺维特(Richard Lowitt)、皮萨尼等杰出农业史学者,他们在不同时期都担任过美国农业史学会会长,其中后两位所从事的资源保护利用史实际上就是环境史研究,皮萨尼还曾担任过美国环境史学会会长。该校目前有皮萨尼、布洛南(Kathleen Brosnan)、埃文斯、李普塞特(Robert Lifset)等多位知名环境史学者。

在欧洲,环境史与农业史的渊源关系可以通过年鉴学派得以呈现。年鉴学派撰写了很多乡村史的杰作,诸如勒费弗尔的《大革命时期诺尔省的农民》(1924)与《大革命恐怖时期的农业问题》(1932)、布洛赫的《法国农村史》(1931)、勒华拉杜里的《朗格多克的农民》(1966)、《蒙塔尤:1294—1324年的奥克族村庄》(1975年)和《法国农民史:从黑死病到大革命》(2002)等。从这些著作的标题就可以看出年鉴学派对农业史的重视。勒华拉杜里被公认为气候史研究的“创始人”,出版过《公元1000年以来的气候史》(1967)、《人类气候比较史》(三卷,2004、2006、2009)。在谈到为什么要研究气候史时,他说,气候直接影响农业收成,进而影响农民生计和乡村稳定。他认为自己的乡村史研究“说到底就是环境史的一种”^①。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念、长时段理论及对地理环境等结构因素的重视,都为环境史学者提供了启发^②。

年鉴学派对环境史的推动常常为欧美学者所提及。美国学者沃斯特认为,年鉴学派“使环境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部分”^③,而罗斯比指出,年鉴学派率先作出不懈的努力,“探讨人作为一个整体,如何与自然界相互作用”^④。芬兰学者蒂莫·米尔恩托斯(Timo Myllyntaus)认为,“年鉴学派率先提出了环境史研究的重要议题。”^⑤英国学者菲奥纳·沃森(Fiona Watson)也提到,年鉴学派为“历史学家展示了非人类世界的重要性。”^⑥欧洲环境史学会会长薇诺娜·威尼沃特也提到,在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农业史是环境史的重要源头^⑦。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环境史与农业史也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这在回顾环境史在中国发展的多篇文章中都有涉及。王利华在追溯生态史的本土渊源时,提到了“农牧林业史学者的研究”,但他指出,这些研究对自然的关注大抵只是“学科研究的外向拓展和延伸”,还谈不上是“从生态环境出发对社会历史运动进行系统解释的努力”^⑧。夏明方、梅雪芹都提到了中国历史文献中有关人口、农业、水利、渔业、森林、牧场等方面极其丰富的信息,在肯定本土有关领域对国内环境史兴起的贡献时,也指出了其间的差异。夏明方结合中国灾害史^⑨研究的“非人文倾向”指出,自然科学“淡化社会性”的做法和“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长期以来的‘环境缺失’现象”,“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灾害史乃至

① 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周立红:《乡村史、气候史及年鉴学派——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教授访谈录》,《史学月刊》2010年第4期。

② 高国荣:《环境史学与年鉴学派》,《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

③ Donald Worster, “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Donald Worster, ed., *The Ends of the Earth: 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291.

④ Alfred Crosby,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00, Issue 4(Oct., 1995), p.1184.

⑤ Timo Myllyntaus and Mikko Saikku, eds., *Encountering the Past in Natu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43.

⑥ 包茂红:《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03页。

⑦ Verena Winiwarter,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Europe from 1994 to 2004: Enthusiasm and Consolidation,” *Environmental History*, Vol.10, No.4 (Nov., 2004), p.502.

⑧ 王利华:《中国生态史学的思想框架和研究理路》,《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

⑨ 中国的灾害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农业灾害史,大体也可划归农业史的范畴。

环境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①。梅雪芹在论及前辈学者关注自然环境因素的同时,也指出了一个事实,即“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严重分野的情形下,一直没能发展出跨学科意义上的环境史概念和作为一种明确的交叉综合研究的环境史领域”,“但有关成果是进一步开展环境史研究和学科建设工作的学术资源和思想源泉”^②。从上述学者的论述来看,早先的农林牧渔史研究虽然涉及环境因素,但这些研究往往反映了学界对人与自然的刻意分离。一方面,历史研究常常存在“环境缺失”的现象,而另一方面,较多涉及环境变迁内容的自然科学缺乏甚至有意削弱人文与社会因素的影响,自然科学的“非人文化倾向”明显。也就是说,国内的研究恰恰反映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隔绝,即便有关于自然环境因素的研究,但自然与社会往往是分开探讨而非联系起来加以分析。这类研究与环境史的主旨——“人与自然的互动”——还有很大差距,从严格意义上不能算作“环境史”,但为环境史的萌生奠定了坚实基础。

国内环境史与农业史的渊源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又名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得以反映。该室是国内唯一的国家级农史专业研究机构,将“农业生态环境史”作为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其主办的《中国农史》杂志是历史类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该刊登载的不少文章有对环境维度的考量,已成为环境史学者发表成果的重要平台。该室培养了在国内环境史领域较为活跃的数位学者。王利华、王建革两位知名环境史学者,都曾在这里受教,获得过农业史硕士或博士学位,其专业优势在他们的环境史研究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挥。该室不但培养了当下的环境史学者,而且还将继续为环境史领域输送人才。

二、农业生态史一直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领域

环境史在多个国家兴起的过程中,农业首先成为环境史学者关注的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农业对自然的直接依赖及其对环境的明显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农业史是环境史的重要学术源头。从我国环境史的研究现状来看,关于中国环境史的已有研究成果绝大多数都属于农业生态史,城市环境史研究几乎是空白,农业生态史主导我国的环境史研究无需进行讨论。从环境史发展最为充分的美国来看,尽管这个领域在近30年间出现了很多新变化,但毫无疑问,农业生态史依然是重要领域。

环境史在美国兴起之初,让学界对这个新领域侧目的就是三本农业生态史著作,即沃斯特的《尘暴》(1979)、怀特的《土地利用、环境与社会变迁》(1981)、克罗农的《土地的变迁》(1983)。《尘暴》一书探讨了1870—1930年间资本主义农业在美国大平原干旱草原地带的扩张及其引起的美国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生态灾难。该书认为,1930年代尘暴重灾区的形成并非天灾,部分是由“人类的愚蠢”所导致的^③,是由于我们的文化对生态的漠视,是“驯服和掠夺自然”^④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必然产物。《土地利用》考察了华盛顿州艾兰县两个岛屿在过去120年间剧烈的生态与社会变迁,探讨了白人的滥伐滥垦活动所导致的环境恶化及生存危机,“松树、蕨类、薊、狗、鲑鱼、土豆、绵羊”等非人类生物在该书中几乎受到了与人同等程度的重视^⑤。而《土地的变迁》则结合北美殖民地时期新英格兰地区土著生计农

① 夏明方:《中国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

② 梅雪芹:《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史学月刊》2009年第6期。

③ 唐纳德·沃斯特:“中文版序”,唐纳德·沃斯特著,侯文蕙译:《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三联书店,2003年,第4页。

④ 唐纳德·沃斯特:“引言”,唐纳德·沃斯特著,侯文蕙译:《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第2-3页。

⑤ William Cronon, “Foreward,” in Richard White, Land Use, Environment, and Social Change: The Shaping of Island County, Washingt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2, xiv.

业的瓦解和资本主义农业的形成,对欧洲殖民扩张所导致的新英格兰地区的生态巨变进行了解释。在这本书中,植物、动物、微生物等非人类生物成为人类历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对非人类事物的重视”是该书最大的独特之处^①,而这正是环境史的创新所在。这三本著作都探讨了资本主义农业破坏性的环境后果,强调人与自然的互动,采用跨学科研究,突出资本主义对不同区域生态与社会系统的破坏。这三本著作都受到了广泛关注,好评如潮,在出版翌年分别获得过美国史学会的班克罗夫特奖、美国森林史学会的最佳环境史著作奖、以及美国历史学家协会的帕克曼奖^②。这三本著作的问世,向学界宣示了一个新领域的诞生,成为确立环境史学术地位的奠基之作,对后学者具有重要的引导和示范效应。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自然资源利用与保护成为环境史的研究重点,美国环境史学者对城市的关注极为有限。

在 1990 年前后,农业生态史成为美国环境史领域的主要突破口。《美国历史杂志》1990 年第 4 期刊登了一组环境史的笔谈。五位环境史领域的翘楚就环境史的动向予以讨论。沃斯特倡导大力加强农业生态史研究,他将环境变迁、生产方式和文化观念作为环境史研究的三个层面,指出经济层面的研究尤其需要加强;人们通过生产从自然获取生产和生活资料,在改变人类与自然“生态关系”的同时,也在改变“人类自身和各种社会关系”,“自然的重组”也是“社会的重组”;食物是人类从自然获取的最基本的资源,人类与自然“最重要、最长久、最具体的联系方式”是在获取食物的过程中形成的,“食物生产必定是环境史领域最主要的探讨之一”^③。早在 1984 年,沃斯特就倡导农业生态史,他曾提到,“环境史常常必定以人们如何填饱肚子为研究起点”^④。另外四篇文章都认可农业生态史的重要性,但同时也都认为环境史研究需要更多的维度。克罗斯比倡导对农业生态史的宏观、整体研究^⑤。怀特认为,食物并不仅涉及物质层面,与文化观念也有密切联系^⑥。而麦钱特强调妇女在农业生态史中的作用,倡导在环境史研究中引入性别分析^⑦。克罗农肯定了农业生态史的重要性,指出“没有农业史的环境史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但他也认为,环境史研究要引入社会分层分析方法,要关注城市^⑧。总之,克罗农等人认为要将环境史的研究领域从农村扩展到城市,要重视社会与文化分析,要将农业生产与人口再生产结合起来。这组文章向学界展示了环境史的多样性及广阔前景,为 1990 年代以来的环境史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文化转向就是从农业生态史率先开始的。1991 年,克罗农出版了《自然的大都市:芝加哥与大西部》一书。该书通过追溯谷物、木材、肉类等农业商品的生态足迹,将城乡视为一个整体,将芝加哥与大西部联系起来,将生产与消费结合在一起,探讨了经济活动

① 威廉·克罗农著,鲁奇、赵欣华译:《土地的变迁——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人、殖民者和生态》,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44 页。

② 美国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AHA)是美国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专业历史学家团体,其宗旨是促进历史科学的繁荣与发展。美国历史学家协会(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 OAH)是美国史学会单位会员,为美国从事本国历史研究与教学人员的学术团体。

③ Donald Worster, “Transformations of the Earth: Toward an Agroecological Perspective in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6, No. 4 (Mar., 1990), pp. 1090–1092.

④ Donald Worster, “History as Natural History: An Essay on Theory and Method”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53, No. 1 (Feb., 1984), p. 17.

⑤ Alfred W. Crosby, “An Enthusiastic Second,”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6, No. 4 (Mar., 1990), p. 1108.

⑥ Richard White, “Environmental History, Ecology, and Meaning,”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6, No. 4 (Mar., 1990), pp. 1112.

⑦ Carolyn Merchant, “Gender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6, No. 4 (Mar., 1990), p. 1121.

⑧ William Cronon, “Modes of Prophecy and Production: Placing Nature in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6, No. 4 (Mar., 1990), pp. 1129, 1131.

所带来的生态巨变。尽管该书并没有涉及“不同阶级和族群之间的社会矛盾”,没有探讨“劳工斗争”、政治博弈、文化纠纷等社会文化史的主体内容^①,这本书依然开风气之先,为美国环境史的研究领域从农村拓展到城市架起了一座桥梁。该书是继沃斯特的《尘暴》之后荣获班克罗夫特奖的第二部环境史著作。此后,越来越多的环境史著述开始探讨城市,并融入了社会文化分析。这一倾向使环境史的研究范畴和分析路径得到深入拓展,成为环境史从困顿走向繁盛的重要起点^②。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农业生态史的新作不断问世,在多个方面较以往有所超越。首先,阶级、种族、性别等社会史的分析方法得到了广泛应用。实际上,克罗农、麦钱特、怀特等学者的早期作品也曾探讨印第安人的生计农业及其与资本主义农业的碰撞,而这方面的研究继续扩展到非裔、墨西哥裔、亚裔等有色人种^③。同时,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成为多部环境史著作的研究重点,环境史研究中的“衰败论”明显减弱。另外,地理信息系统(GIS)成为农业生态史研究的重要分析工具。《大草地》《大平原的农业与环境》两部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④运用大量统计数据,进行计量分析,阐明美国农业发展具有可持续性,明显不同于沃斯特和克罗农对资本主义农业的批判。此外,南部农业生态史日益受到关注。还有一些学者尝试在全球史的视野下研究农业生态史^⑤。

尽管环境史的社会文化分析倾向蔚然成风,农业生态史研究依然引人注目。这可以从美国环境史学会最佳图书奖的获奖名单看出。该图书奖的评选始于 1989 年,到 2017 年,共有 28 本图书榜上有名,其中有近 1/3 的获奖图书属于农业生态史的范畴,获奖作者既有麦克沃伊(Arthur F. McEvoy)、克罗农、奥佩等环境史领域的拓荒者,也有多纳休(Brian Donahue)、麦卡恩(James C. McCann)、索勒瑞(John Soluri)等声誉鹊起的新秀^⑥。美国农业生态史领域可谓强手如林,皮萨尼、西尔韦(Timothy Silver)、斯图尔特·柯比(Jack Temple Kirby)、萨特(Paul Sutter)、菲格(Mark Fiege)、斯托尔(Steven Stoll)、坎费尔(Geoff Cunfer)、菲茨杰拉德(Deborah Fitzgerald)、科恩(Benjamin Cohen)、赫西等老中青知名学者组成的团队,表明这个领域充满活力,后继有人。

三、农业史与环境史的交流合作日益频繁密切

在美国,环境史与农业史之间的交流合作一直存在,而且呈增加趋势。环境史在美国兴起之初,美国环境史学会将《农业史》作为发布资讯的重要平台。环境史学者常常参与农业史学会主办的会议,随着两个领域的学术交流日益增多,环境史的价值得到了农业史学会的广泛认可。

美国环境史学会在创办之初,曾借助《农业史》杂志刊登多种资讯。实际上,在环境史作为一个领域出现之前,环境问题已经受到部分农业史学者的关注,这在《农业史》杂志中有所反应。该刊在《哥伦布大交换》一书出版的翌年,就刊登了书评,评论人拉斯马森(Wayne D. Rasmussen)为知名农业史学

① William Cronon, *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1, Preface, xv.

② 高国荣:《近二十年来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文化转向》,《历史研究》2013 年第 2 期。

③ Dianne D. Glave, Mark R. Stoll, eds., *To Love the Wind and the Rain: African Americans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6; Chad Montrie, *Making a Living: Work and Enviro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9.

④ Brian Donahue, *The Great Meadow: Farmers and the Land in Colonial Concor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Geoff Cunfer, *On the Great Plains: Agriculture and Environment*, College Station: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⑤ Sara M. Gregg, "Cultivating an Agro-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Douglas Sackman, ed., *A Companion to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pp. 425-441.

⑥ <http://aseh.net/awards-funding/award-recipients/george-perkins-marsh-prize-list-for-best-book>.

者,他对该书充满争议的新颖观点予以肯定,提倡“对农业史和生态学感兴趣的人都应该读这本书”^①。1975年1月,该刊还就“农业与西部环境”发表了一组文章,共计四篇,这组文章在1974年6月美国农业史学会主办的“美国远西部发展进程中的农业”学术研讨会中的一场专题讨论会上宣读。在庆祝美国农业发展成就的会议上,这场小组讨论好像唱起了“反调”^②,主持人卡斯滕森(Vernon Carstensen)指出了农业对环境的改变,特别提到了资源保护主义者乔治·马什(George Marsh)及罗德民(Walter C. Lowdermilk)关于“善待土地”的劝诫,而四位发言人则从多个方面探讨了农业环境问题及环境观念的变化^③。因此,毫不奇怪,除美国森林史学会(Forest History Society)专业期刊《林业史杂志》(Journal of Forest History)外,《农业史》杂志成为最先发布环境史信息的平台之一。该刊于1975年第4期刊登了《环境史研究通讯》的征订消息^④。《农业史》1983年第1期发布了美国环境史学会征集年会论文的通知,要点如下:“美国环境史学会将于1983年4月8-10日在迈阿密大学举行学术会议,大会组委会现征集有关环境史研究的方法、视野和主题的论文……尤其欢迎突出中西部环境变化、具有跨国或跨文化视野、探讨美国以外地区环境变化的论文。”^⑤《农业史》杂志1983年第2期又刊登了《环境评论》编辑部迁址的资讯,提到“编辑部迁往丹佛大学历史系,休斯(J. Donald Hughes)接任约翰·奥佩担任刊物主编”^⑥。

同时,环境史学者也参与农业史学会举办的会议。1984年5月,福莱德(Susan Flader)所在的密苏里大学文化遗产中心与美国农业部、美国农业史学会共同主办了“土壤和水资源保护史”学术研讨会,福莱德与农业部专家道格拉斯·赫尔姆斯(Douglas Helms)受邀为《农业史》杂志编辑了“水土保持史”专辑^⑦。1991年,农业史学会主办了“农业与环境的历史”学术研讨会,奥佩、休斯、利尔(Linda Lear)等环境史学者与会,其提交论文在《农业史》杂志1992年春季号集中刊登。但总的来看,在新世纪之前,这类交流并不常见,只有福莱德、皮萨尼等少数环境史学者经常参加农业史学会的活动。

甚至有农业史学者讲授环境史。威斯康辛大学的艾伦·博格最为典型,他是老一辈农业史权威,1963-1964年曾任美国农业史学会会长,在20世纪80年代开设过环境史课程^⑧,指导刘易斯(David Rich Lewis)、霍夫曼(Thomas R. Huffman)、坎农(Brian Q. Cannon)、赖尼-凯尔伯格(Pamela Riney-Kehrberg)等弟子做农业生态史方面的研究^⑨,而他的太太玛格丽特·博格(Margaret Bogue)也是

① Wayne D. Rasmussen, *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 by Alfred W. Crosby, *Agricultural History*, Vol. 47, No. 3 (Jul., 1973), p.269.

② Lawrence B. Lee, “Environmental Implications of Governmental Reclamation in California,” *Agricultural History*, Vol.49, No.1(Jan.,1975), p.223.

③ Vernon Carstensen, “Agriculture and the Western Environment: Introduction”, *Agricultural History*, Vol.49, No.1(Jan., 1975), p.221.

④ “News Notes,” *Agricultural History*, Vol.49, No.4(Oct.,1975), p.707.

⑤ “News Notes,” *Agricultural History*, Vol.57, No.1(Jan.,1983), pp. 140-141.

⑥ “News Notes,” *Agricultural History*, Vol.57, No.2(Apr.,1983), pp.255.

⑦ Douglas Helms & Susan Flader, *The History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 Symposiu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福莱德是研究利奥波德的权威学者,1993—1996年先后任美国环境史学会副会长和会长,期间努力促成了美国森林史学会与美国环境史学会专业期刊的合并。

⑧ “Agricultural History Talks to Allan and Margaret Bogue,” *Agricultural History*, Vol.79, No.3(Summer 2005), pp.358-361.

⑨ David Rich Lewis, *Neither Wolf Nor Dog: American Indians, Environment, and Agrarian Chan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Thomas R. Huffman, *Protectors of the Land and Water: Environmentalism in Wisconsin, 1961-1968*,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4; Pamela Riney-Kehrberg, *Rooted in Dust: Surviving Drought and Depression in Southwestern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4; Brian Q. Cannon, *Remaking the Agrarian Dream: New Deal Rural Resettlement in the Mountain West*,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96. 以上几本著作都以博格指导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其主题与环境史有密切联系。

著名农业史专家,1984-1985年曾任美国农业史学会会长,在回顾她的学术生涯时,她甚至将古稀之年出版的《五大湖区的渔业:环境史》视为代表作^①。

进入新世纪以后,环境史与农业史之间的交流更趋频繁。两个领域的新一代学者都日渐意识到增长与保护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开始关注此前被忽视的环节。环境史受到了美国农业史学者的广泛关注。《农业史》杂志近年来对该领域的近20位知名学者就农业史的现状与前景进行访谈,艾伦·博格、玛格丽特·博格、皮萨尼、赖尼-凯尔伯格、菲茨杰拉德、坎农、吉尔伯特(Jeff Gilbert)等十多位学者都重视环境史视野对农业史研究的价值。玛格丽特·博格提到,“历史视野中食物生产的环境影响”是未来农业史研究中“值得探讨的问题之一”^②。皮萨尼认为:“农业与乡村史在美国人同自然与土地的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对环境的关注可以拓展农业史”^③。赖尼-凯尔伯格认为,在环境史视野下研究农业,将会有很多新发现^④。菲茨杰拉德在2005年美国环境史学会年会期间,意外地发现有“约32个学者参加了农业生态史的早餐会”,这些学者对“自然和景观、国家对土地利用的管制、自然资源的利用者”等问题很感兴趣^⑤,由于志趣接近,农业史学者与环境史学者在不知不觉中走到了一起。唐邦(David B. Danbom)2009年获得过美国农业史学会授予的杰出成就奖,他在对农业史进行回顾和反思时特别提到了环境史的贡献,他提到,克罗农、西尔韦、斯托尔、怀特、沃斯特、邓拉普(Thomas Dunlap)等学者的著作极大地加深了人们对乡村环境的理解^⑥。

与此同时,环境史的价值也得到了美国农业史学会的充分肯定。这表现在多个方面。其一、进入新世纪以来,农业史学会表彰的优秀成果,有很多出自环境史学者之手。多纳休(Brian Donahue)、坎费尔(Geoff Cunfer)、汉密尔顿(Shane Hamilton)、埃文斯(Sterling Evans)、库什曼(Gregory Cushman)等多人获得过农业史学会授予的年度优秀著作奖,而菲利普斯(Sarah T. Phillips)、皮萨尼(Donald Pisani)、格雷格(Sara Gregg)、怀特(Sam White)等多人获得过年度优秀论文奖。获奖成果有的出自剑桥大学出版社“环境与历史研究”丛书系列,有的刊登于《环境史》杂志。还有一些获奖成果的作者虽然没有环境史的专业背景,但以生态变迁为主题,或是采用生态的视角加以分析^⑦。其二,从近年召开的农业史学会年会来看,生态因素也受到了相当重视。2008年学会年会以“密切关联:全球视野下的农业、环境与社会”作为大会主题。最近几年,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小组讨论,在学会年会上往往不少于五组^⑧。2016年美国农业史学会邀请知名环境史学者斯坦伯格(Ted Steinberg)在年会上作主题发言,赫西(Mark Hersey)、马埃尔(Neil Maher)、奥古特(Frank Uekötter)等环境史的后起之秀是大会组委会成员。此外,农业史学会网站在“知名专家”版块介绍了埃文斯、萨特(Paul Sutter)、格雷格、赫西等环境史学者^⑨。埃文斯现任农业史学会副会长,萨特是《农业史》杂志编委。近年来,环境史学者在美国农业史学会年会上非常活跃。另外,2013年《农业史》杂志发布了征集“南部农业、乡村及环境史”论坛会议论文的通知。论坛主办方为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南部农业、科学与环境史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Agriculture, Science, and the Environment of the South, CHASES)。该中心在美国农业史学会年会上多

① Margaret Bogue, *Fishing the Great Lake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1783-1933*, Madison, W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0.

② “Agricultural History Talks to Allan and Margaret Bogue,” *Agricultural History*, Vol. 79, No.3(Summer 2005), p.368.

③ “Agricultural History Talks to Donald J. Pisani,” *Agricultural History*, Vol. 81, No. 4 (Fall 2007), pp. 465-466.

④ “Agricultural History Talks to Pamela Riney-Kehrberg,” *Agricultural History*, Vol. 88, No. 1 (Winter 2014), p.21.

⑤ “Agricultural History Talks to Deborah Fitzgerald,” *Agricultural History*, Vol. 79, No. 4 (Autumn 2005), p.411.

⑥ David B. Danbom, “Reflections: Whither Agricultural History,” *Agricultural History*, Vol.84, No. 2(Spring 2010), p.171.

⑦ <http://www.aghistorysociety.org/society/awards/past/>.

⑧ <http://www.aghistorysociety.org/meetings/past/>.

⑨ <http://www.aghistorysociety.org/members/>.

次组织大会活动并为之提供赞助。

随着两个领域交流日益密切,农业史与环境史之间的边界可能会趋于模糊。水利史专家皮萨尼(Donald Pisani)曾担任环境史学会会长(1997-1998)和农业史学会会长(2006-2007),他说,没有必要就专业领域做严格划分,差别“主要在于所提出的问题和我们所做的研究,而不是我们对自己研究领域的界定”。在他看来,“农业史是环境史的主要基石之一”^①。英国环境史的创始人斯马特(T. C. Smout)也提到,英国的《农业史评论》也常常发表与环境史有关的论文^②。可以预见,环境问题在农业史学界将得到更多的讨论。

在肯定农业史和环境史密切联系的同时,也要看到二者之间的差异。从人员构成来看,这两个领域的学者在成长背景上往往存在城乡差异。两个领域在治史理念、中心问题和价值评判标准方面也有区别。这种差异在环境史初兴之际会妨碍其与农业史的交流,但在环境史地位较为稳固后,就转化为其与农业史互为启发、互为补充、互为映照、互为奥援的优势,二者之间的融合在未来会更为明显。尽管两个领域的学术交流目前还仅限于学者之间,或者是学者与机构之间,但随着跨领域学术交流的密切,两个学会或许会联合开展学术活动。

总之,农业史和环境史之间存在着难分难解、彼此促进的密切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环境史从农业史中来,又重新回归农业史,为农业史的复兴助力。首先,农业史为环境史的萌生提供了滋养,成为环境史的重要学术源头之一,为环境史的兴起在学术资源和人才队伍方面创造了一定条件。在美国,作为环境史源头的西部史和南部史均以农业史为主要研究内容;在欧洲,年鉴学派在农业史与环境史之间架起了桥梁;在中国,农业史背景的学者在环境史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其次,农业史和环境史的研究对象有显著的重合。农业是人们通过社会劳动、借助动植物等的生长繁殖获取包括食物在内的各类资源的活动,是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重要方面。农业活动必然涉及动植物、微生物及水土光热等自然条件,必然涉及具有生物和社会双重属性的劳动者。农业生产作为连接农业史和环境史的枢纽,成为二者研究的共同内容。食物史已成为两个领域共同的研究热点。再次,农业生态史一直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从美国来看,最先获得学界认可的环境史成果是农业生态史著作,这些著作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为环境史在学界赢得了一席之地;农业生态史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一直占环境史研究的主导地位,并成为此后环境史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尽管近30年间美国环境史研究出现了很多新变化,但农业生态史依然是重要领域。从理论上说,农业生态史占据环境史研究的半壁江山。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几乎不可能绕开农业生产;环境史脱离对农业问题的探讨,就不可能发现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奥秘。

最后,环境史促进了农业史研究。环境史在兴起之后,以新的视野、理论、方法对历史上的农业问题进行分析和解读,为农业史研究提供了新维度,丰富和发展了农业史研究。环境史的价值近年来逐渐为农业史学者所接受,带动了农业史研究的生态转向,两个领域的边界也越来越模糊。在未来,农业史学者和环境史学者会更加频繁密切地开展学术交流,并以包容的心态吸收其他学科的优长,促进农业史和环境史领域的共同繁荣进步。

① “Agricultural History Talks to Donald J. Pisani,” *Agricultural History*, Vol. 81, No.4(Fall 2007), p.465.

② T. C. Smout, *Explor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7.